

美育

学刊

《美育学刊》文萃第一辑 · 美学研究卷

《美育学刊》杂志社◎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育

学刊

《美育学刊》文萃第一辑 · 美学研究卷

《美育学刊》杂志社◎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育学刊》文萃第一辑·美学研究卷 / 《美育学刊》杂志社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0

(《美育学刊》文萃·一)

ISBN 978-7-5161-8633-6

I. ①美… II. ①美… III. ①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4938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5千字
定 价 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艺术学理论）科研资助项目成果

总 序

《美育学刊》于2010年6月获批创刊，2010年11月出版创刊号，自2011年1月起逢单月出版（双月刊），每期120页，统一刊号为CN33-1367/G4（ISSN2095-0012），系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总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入网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主要栏目有美育研究、艺术教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艺术研究、审美文化研究等，并适时设立专稿，开展美育相关前沿问题的研究。《美育学刊》由杭州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为目前国内唯一的美育研究学术刊物。

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于1920年4月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杂志《美育》，刊名由当时已出家的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师李叔同（弘一法师）题写。为继承美育优良传统，响应全国美育界日益高涨的美感教育之呼声，杭州师范大学决定编辑出版《美育学刊》。创刊至今，适逢党和国家大力弘扬美育之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42条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是党中央首次将美育问题写进重大改革事项，表明立德树人离不开美育，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也离不开美育，且必须从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入手。2014年1月，教育部发布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并着手制订改进美育教学的实施方案。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也是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颁布的关于加强学校美育工作的文件，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改进美育教学作出的重要部署后，国务院对加强学校美育提出的明确要求，文件强调

整合各类美育资源,促进学校与社会互动互联,形成全社会开展美育的氛围。可见,加强美育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之急需。有效的美育实践需要美育理论研究的支撑和引导。是故,《美育学刊》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美育学术刊物,其重要性和特殊性日益得到彰显。

《美育学刊》自创刊起即将刊物定位于面向国内外学者的美育研究学术刊物。刊物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山东大学资深教授曾繁仁、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徐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担任顾问,著名美育专家杜卫教授担任主编。创刊六年来,影响力日益扩大。在2012年公布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1年转载率统计结果中,《美育学刊》在全国141家艺术类期刊及其他相关综合性期刊中列第14位;在中南财经大学文献索引中心公布的2012年、2015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美学类论文转载数据中,《美育学刊》列全国第1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28期也刊发了介绍《美育学刊》的文章,并全文刊发了《美育学刊》的发刊词。2015年和2016年,《美育学刊》被连续评为“中国最美期刊”。

为展示《美育学刊》创刊以来的学术成果,《美育学刊》杂志社决定出版“《美育学刊》文萃”,选择2010年至2015年的优秀论文先行出版3辑,第一辑为《美育与艺术教育研究》,第二辑为《美学研究》,第三辑为《艺术研究》。各辑所收论文按发表之先后排列(同期发表者,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我们希望通过此三辑“文萃”的展示,既作为办刊初期的学术小结,又能体现我国学者在美育与艺术教育研究乃至美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些优秀成果,更期待得到国内外学者对《美育学刊》的大力支持,共同为我国的美育事业贡献智慧,以顺应时代之呼唤。

《美育学刊》杂志社

2016年10月

目 录

后文化研究时代的美学	高建平 (1)
一生与青年为友的美学家	
——论朱光潜的美学动机和美学情结	陈文忠 (21)
童心与同情的美学	
——丰子恺漫画中的幽默	肖 鹰 (43)
库萨的尼古拉论美	陆 扬 (51)
北宋理学家的伦理美学思想	潘立勇 (59)
《诗经》中的女性美与昆虫	
——生态美学管窥	李杰玲 (75)
论朱光潜对康德“自然美”观念之误读	萧 湛 (93)
敬美如敬神	
——柏拉图《斐德罗篇》的阐释	潘一禾 (103)
康德美学中审美愉快与官能和谐之关系	陶 锋 (119)
礼：中国美学起源时期的核心	张 法 (131)
“才盛情深”与“情深才完”	
——论古代文艺审美中的才情相生思想	赵树功 (139)
抒情作品与审美伦理	徐 岱 (153)
也谈本雅明的 aura	杨俊杰 (183)
审美的文化“深描”	
——新历史主义的美学特性	张静斐 (190)
艺术体制及其批判	唐宏峰 (207)
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的浪漫主义	邓军海 (221)
丑的四种历史形态	薛富兴 (236)

《尚书》美的核心：“休”美之研究	刘天召 (252)
直觉、艺术与审美主义	
——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自由”之“思”	张 中 (263)
斯宾格勒艺术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吴时红 (281)

后文化研究时代的美学^{*}

高建平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学”一词在中国发生了太多故事：有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美学大讨论”，有“文化大革命”后的“美学热”，后来被人们宣布为过时，到了世纪之交，人们又重谈美学。2010年8月9日至13日，我在北京大学参与主持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是一个国际美学界前所未有的盛会，参加者有包括许多世界最重要的美学家在内的国外美学研究者近400人，国内各地从事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学者900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人来旁听。这可能是美学在中国走向复苏、重现辉煌的一个象征。接下来我所要讨论的，是今天我们所做的美学和过去的美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曾经流行过“文化研究”，这一研究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可能有人会觉得，文化研究者做文化研究，美学研究者做美学研究，分属不同的学科，本来可以互不干扰，各自在自己的学科内活动。当我们说“后文化研究时代的美学”之时，就把两者拉扯到了一起，好像两者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似的。它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又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在中国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这个角色后来被文化研究所取代，今天在重新恢复美学的地位时，仍需从文化研究中吸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实际上，在中国，做美学研究与做文化研究的人，差不多是同一个群体。两种研究之间，有着竞争的关系，竞相赢得中国最具前沿性、最

^{*} 本文根据笔者2010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王光明教授组织这次讲演，感谢赵飞同学整理此稿。

有创造活力的学者的注意。这种竞争关系的形成，与这两门学问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有关。这也是我想说明的一个意思：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相互运动，在像美学和文化研究这样一些学科中不断地发生着，时代对这种运动的结果做出选择。

一、美学与 80 年代

我的第一个话题，就是“80 年代”。当然，这里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 80 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有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的经济社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个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如果深入历史细节，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广播、电视和报纸上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奇怪的。不仅是语言，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论证问题的方式，都是很奇怪的。意识形态与语言表达互为表里，语言表达的方式，是当时思维方式的表现。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关于那一时代社会情况的直观图像，现在已经不常见到了。前不久有一位年轻的朋友送我一盘光碟，是一部电影，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部电影我过去没有看过，但批判过。“文革”后期时，突然有关部门要求批判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歪曲、丑化中国形象。于是，大家都跟着批。只让批，不让看。反正那个时代什么都批，人们也习惯了。现在终于能看到了，尽管电影拍得很沉闷，我还是充满好奇地看完了。这部电影很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中国。从服装上看，清一色的蓝衣服，男女都如此。那个时代的中国是没有色彩的，没有色彩硬要拍出色彩，实际上并不可能。但是，那时掌管宣传工具的人就本能地认为，这是丑化。这样一来，一位本来很爱中国的意大利左翼电影家，就此倒了大霉。他本想善意地记录中国，却被说成是恶意地丑化中国。

中国人服装上的色彩，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慢慢出现。当我们看到色彩鲜丽的 80 年代电影时，就感到，那时一切都在改变。从外观上看是这样，从思想和心灵上讲，就更是如此。从一个封闭的中国，走向一个开放的中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工作

者们做了很多的事。我们今天都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描述这一段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确立。当然，这一切都很重要。但是，如果细读历史，就会发现，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就已经行动起来。文学常常走在时代的前面，诗歌总是第一朵报春花。

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的变革，借助了这样一个契机：《诗刊》1978年第1期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谈写诗的问题。这封信同时也刊登在1977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缘起是这样的：陈毅元帅很喜欢写诗，也对毛主席的诗才很崇拜，于是就把自己写的诗送给毛主席，请他改。毛主席回信的大意是：你让我改诗，我只改了一首，还不尽如人意。写诗是需要“形象思维”的，要用“比兴”手法。白话写诗不成功，将来的诗可能会从民歌中汲取养料。信很短，文字也很随意。陈毅与毛泽东从井冈山年代就在一起共事，私人通信远不止这一封。何况，这是一封旧信，写于1965年，等到1978年发表时，当事人都已逝去。但正是这封信，在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这封信发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朱光潜发表了3篇文章，李泽厚发表了3篇文章，蔡仪也发表了3篇文章，来讨论这封信。他们都抓住了“形象思维”这个词，发挥对这个词的理解。至于资料集一类的书，更是大量涌现。1978年2月，复旦大学教师们集体完成了《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的编辑工作，并在3个月后出版。很快，全国各地许多大学的文学理论老师都行动起来，编辑出版了各种类型的资料集。在这些资料集中，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近50万字的巨著《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许多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学者都参与其事。

当时，从事美学、文学、艺术研究的学者们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兴奋点。这也是一个理论上的着力点，就像拿起重物所需要的一个抓手。“形象思维”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正像理论上的抓手一样，抓住了它，推倒“文革”时代的文学理论，就用得上劲了。“美学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形象思维”的讨论早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的讨论在1978年年中才开始，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在1978年底才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用生活实践的观点，来打破当时盛行的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因此，它是从理论的消解开始的。当全国人民都被发烧的理论热昏了头的时候，

生活实践的观点,可以帮助他们解开理论套套,睁眼看世界,处理最紧迫的生活实践问题。与此相反,从“形象思维”开始的“美学热”,是从理论的批判和建构开始的,相比之下更具有理论的品格。

在这里我想作一个词义辨析。有人说,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有过三次“美学热”。这三次美学的热潮,分别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社会语境。第一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一般称为“美学大讨论”,主要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这一讨论的发展趋势,是从“美的本质”到“形象思维”。通过“美的本质”的讨论,将美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通过“形象思维”,将美学讨论引向艺术的独特性的研究。第二次美学的热潮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一般称为“美学热”。这一时期美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形象思维”到“美的本质”。通过“形象思维”,走出“文革”的文艺理论体系;通过“美的本质”的讨论,与西方美学接轨。第三次美学热潮则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我愿将之称为“美学的复兴”。通过“复兴”,形成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对话关系。

“美学热”对于“文革”之后的意识形态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美学大讨论”,形成了许多现成的理论话语。到了80年代,这些话语就成了新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

“美学热”还是思想理论界对外开放的一个起点。当时有一套“美学译丛”,是由李泽厚主持的一个译丛。与此同时或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译丛,翻译出版了国外的美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

当时的这些译丛,打破了自从“文革”以前就有的一个理论翻译禁区。过去,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商务印书馆为主。商务印书馆有一个“汉译名著”丛书,最初的时候,只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来圈定选题。“三个来源”是指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这意味着只能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出现以后的西方其他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对我们有没有参考意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西方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就不再有价值?这些著作是否还有新的创见?能否给我们以启发?是否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它们进行批判的吸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成其为问题,但在当时,人们受思维惯性

的影响，做起事来还困难重重。80年代提供了这样一种气氛：干起来再说！不争论，让事实说话。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美学译丛出版了，国外的许多思想进来了，思想理论界活跃起来了。

“美学热”在这方面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从美学译丛，到哲学译丛，再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译丛，中国学术界有了新的思想方法，有了新的语汇，有了与世界接轨的意愿和氛围，从此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在这一时期，美学在走向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美学研究者们都是批判“文革”的急先锋，而“文革”批判当然是当时最大的跨学科的任务。正像以“文化”为名的“革命”并不仅限于“文化”，而成为一场波及全社会的动荡一样，旨在使中国走出“文革”意识形态的“美学热”，也是一场以文学和艺术为中心，又超越文学艺术的多学科的运动。

在这一时期，美学研究者们也试图进行学科建设，引入国外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美学观念，从而在中国确立美学学科，努力建构中国美学的体系，并进行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在8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的前半期，这种工作与美学发挥社会效应，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一种活动所具有的双重效应。美学研究者致力于学科的建构，这一工作同时起着社会文化批判，特别是“文革”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许多并不从事美学专业研究的青年学子，甚至许多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无关的学者，也对美学感兴趣。今天，在50岁以上的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家里的书架上，也许照样能看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当时流行的著作。在当时，“美学热”是全社会性的，美学所讨论的话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80年代的许多争论，在今天看来，理论上可能显得幼稚，但具有历史意义。例如，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讨论，等等。今天，有人觉得那时的讨论太幼稚了，不值得回顾。与这些同行相比，我倒是有兴趣常回头看看。其实，今天看上去很幼稚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如果联系当时的语境来思考，就会发现其重要的意义。

80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新思想、新方法和创造激情的时代。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一位学者作出这样的发问：我们是不是要像怀念“五四”精神一样地去怀念80年代精神？这个发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我会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80年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没有80年代,此后的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所具有的“新启蒙”精神,那种充满青春气息、充满创造性、要冲破一切思想牢笼的气势,在90年代就淡去了。

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都在研究“思想史”;许多研究哲学的人,都在研究一种被称作“国学”的东西。这背后有一个语境,就是感到80年代的学风太浮躁。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想象、充满创造的年代,但也是一个浮躁的年代。短短的10年,西方百年间出现的各种思想和文学方法,中国人都要尝试一遍。人们追求着西方最新的东西,不断地宣布什么东西过时了。记得在80年代末时,就有一位学者带着嘲讽的口吻对我描述过这种情况:一段时间里,有人说最时髦的是萨特,这时,萨特的书还没有译成中文。等到萨特的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时,他们就说,萨特已经过时了,现在时髦的是海德格尔。等到海德格尔的书译成中文时,海德格尔已经过时,新的时髦人物又出现了。当时,人们动不动就宣布某某过时,学界时有新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这是80年代学风不好的一面。

二、文化研究的兴起

80年代以后,就迎来了90年代。如果没有对这两个年代的深入了解,很可能会感到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80年代后不就是90年代吗?但我想说的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那种“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精神,那种勇于学习、勇于实践的学术气氛,造就了一种“新启蒙”的话语。到了90年代,学术气氛为之一变,来到了一个“后启蒙”时代。这是一种对启蒙的反思。从90年代的观点看,80年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有想象,有激情,就是没有规范;在学术上,想法有,但不专业;在美学中,新东西进来了,但消化不良。

90年代出现了一种对80年代的激烈的反拨。这种反拨,首先表现为强烈的学科化的追求。在80年代,美学在学科建设与社会政治批判的相互促进中得到了大发展;而到了90年代,美学呈现出放弃社会政治批判以实现学科纯粹化的趋势。然而,这种纯粹化是以该学科退出公众视野——并且,由于中国学术与媒体特有的亲缘关系,导致美学这一学科实

际上是以消退为代价的。

90年代初的学术界，学科化得到空前发展，这种发展与现代学术制度的恢复、建立和逐步完善联系在一起。在大学里，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得到建立，美学成为大学的选修课，甚至是必修课，哲学系、文学系、艺术系，以至外语系的学生都要修这门课。教育部对学生的要求，也从德、智、体三项变为德、智、体、美四项。于是，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以及大学专科学生的课程表上，也列上了美学课。怎样普及美学课，使它规范化，写出更多的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教材，成为许多教学研究者的任务。为了给这些不同层次的学生上美学课，又培养了大批的美学教师。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讲90年代美学的萧条和衰退时，许多大学教师都不赞同，他们可以用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这一简单的事实来驳斥我的描述。

然而，美学的创新能力的消退，毕竟是不争的事实。美学文章新意不多，美学会议上的学术讨论只是在重复老旧的话题。除了中国美学史以外，其他的一些新文章，似乎很难为这个学科积累新的知识。90年代初，又恰恰是“文革”后上大学的一代年轻学者逐渐走上学术前台的时期。如果说，在80年代初的“美学热”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像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发表文章的老一代美学家，以及像李泽厚那样一些五六十年代开始发表文章的中年一代美学家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文革”后受教育的一代年轻学者开始登上了学术前台。他们当然也可以继续前一代人的争论，但那些争论一下子也很难有新的突破，同时，所争论的话题，离艺术的实际似乎很遥远。“形象思维”早已被李泽厚宣布为不是思维了，“美的本质”与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又很难挂钩。寻找新的话题，就显得很重要，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为此而焦虑。

经过了从1989年到1990年的思想振荡以后，“新启蒙”的话语成为过去。美学变得日益学科化，不再起公共论坛的作用。对于社会、政治，对于思想文化界在当时普遍关心的话题，美学不再能跟上。中国的学术，有着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它与媒体一直有着一种亲缘关系。在离开媒体而只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的时候，美学就渐渐丧失了活力。与此相反，在这一时期，一种泛文化研究吸引了年轻一代研究者的注意。这种研究，与从西方引进的一些学术成果有关，如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法国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当

然文化研究在它最热的时候也比不上 80 年代的“美学热”。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第 1 版一次就印了 20 万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也出版印刷了几十万册。90 年代的文化研究虽然比不上 80 年代的“美学热”，也还是很受欢迎的。原因是当美学不再起公共论坛的作用的时候，文化研究将这种责任承担了起来。我说的公共论坛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特点，它对当下的种种问题，用一种学术的语言来进行回应。

文化研究和美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像美学一样扮演“新启蒙”的精英文化的角色。当然，“启蒙”一词的运用，有其独特的语境。启蒙本来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些文化精英要普及各个学科的知识，以实现唤醒民众的目的而产生的。80 年代的确有“新启蒙”的特征，它具有精英文化倾向。将之称为“新启蒙”，还不仅仅是以其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还与中国的五四运动相比，具有对民众进行新一轮启蒙的特点。中国社会需要走出“文革”，当时有一个口号：走出中世纪。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文革”不是中世纪。但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这么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口号也有一定真实的内容。“新启蒙”起了走出蒙昧的作用。到了 90 年代，文化研究不再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也不再具有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色彩。文化研究关注的更多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种亚文化群体的研究，关注下层社会，关注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比方说英国的雷蒙·威廉斯关心工人的文化权力，实际上是把原属于知识界的或者是上层社会的東西扩展到全社会，这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研究，带有一种和美学研究相对立的色彩，是反美学的。所谓“反美学”，反对的是康德式的、自律的、独立的、封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其实美学从根源上讲，确有这样一种色彩，它从康德开始，并与后来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美学是康德式的。西方美学一般认为是从古希腊开始的，但美学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而不是古希腊那种美和艺术的片言只语，则是从 18 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从 18 世纪初夏夫茨伯里提出审美无利害，维柯提出神话思维，到 18 世纪中叶鲍姆加登提出“美学”概念和夏尔·巴图提出“美的艺术”概念，直到康德对此前的各种思想因素的综合，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美学”才形成。而在中国，美学的引入和建构则是在 20 世纪才开始的。最早是由王国维将他在日本学到的一些美学知识介绍到国内，并利用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进行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和小说的研究，再到蔡元培倡导美育，宗白华进行中西艺术

比较和朱光潜把西方各种理论编入一个体系，再充实进中国的例子，这个学科在中国才慢慢形成。这基本上是康德线索的美学，强调审美是无功利的。

朱光潜曾经给予这种美学一个最简明的描述。我们看一棵古松，有三种态度：有科学家的态度，有商人的态度，还有画家的态度。科学家的态度是看出这个松树属于哪个纲、哪个目，木材商人的态度是这棵松树的材质怎样，画家的态度是这棵松树形态怎么样。在这三种态度中，只有画家的态度才是无功利的。无功利不等于观看不认真，相反，正因为无功利，才抛弃了其他方面的考虑，而专注于对象本身。有其舍，就有其取。舍弃了种种复杂的知识论的、伦理学的，以至日常生活的功利考虑，注意力集中到了形与色等纯粹的视觉要素之上。就像盲人听觉更灵敏、聋哑人视觉更敏锐一样，由于不做知识性和功能性的联想，一棵古松的审美要素得到了突出。

康德美学的这一立场，尽管自它形成时起，就受到很多人的批判，但它却在经过种种修正以后，被保存下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美学主流。20世纪的许多重要美学家，如爱德华·布洛、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的思想，背后都有着康德美学的影子。

康德美学在中国，也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在80年代的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受批判的宗白华、朱光潜的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宗白华先生的身后之名，恐怕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他的文章并不多，80年代初只出了一部不太厚的论文集《美学散步》，以后又整理出版过不多的几本书。但是，我看到过不下10本以宗白华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还参加过其中一些论文的答辩。我没有看到的，恐怕就更多了。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如果列出关于宗白华的学位论文的题目、答辩时间，作一番对比，画出宗白华学术地位上升的曲线，一定很有启发性。朱光潜提出的三种态度说，宗白华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并且做中西美学和艺术比较，都深受康德美学影响。

另一位重要的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代表，是李泽厚。李泽厚曾说，如果让他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选一个的话，他宁愿选康德而不选黑格尔。这番话曾被人传成他要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选一个，他宁愿选康德，因此受到了批判。2001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第十五届世界美学大会，有一位夏威夷大学来的代表讲李泽厚美学，说李是用马克思修正了康德。我说，也许正